

文津阁本宋代别集的价值及其相关问题

〔台湾〕黄宽重

一、前言

一九九七年八月，中国大陆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杨讷、李晓明编辑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据文津阁四库全书补》（以下简称《补遗》），全书精装十五巨册，都二百余万字。这是世人第一次将二种不同阁本的四库全书，经过比对、录异所进行的整理、辑佚工作。虽然仅见集部，但已颇能看出文津阁本的价值。

本文以四库全书集部宋代别集的部分为例，经由比对、校勘等方式，以实例说明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歧异之处及其价值。《补遗》所辑宋祁著《景文集》及汪元量著《湖山类稿》不仅增补文渊阁本甚多的内容，与点校出版的《全宋文》所收《景文集》及增补的《增订湖山类稿》仍有许多值得订补比勘之处，特以此二书为例，详加说明，以了解本书的价值。此外并列举本书编辑上的若干问题，向编者及读者请教。由于笔者未能亲自全面翻阅、比对二种不同阁本的内容，对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的实际内容无法详加了解（如文津阁本失收者为何等），对二种阁本的优劣难以评断，因此本文所据以讨论的资料，均以《补遗》所呈现者为准，疏漏之处必多，敬请指教。

二、《补遗》中所见宋代文集的内容与价值

《补遗》一书,辑录文渊阁本所失收的宋人诗文共 1160 条,分属 118 种宋人文(诗)集。这些资料中以附录的形式增补撰者生平事迹及后人评论者有:徐铉《骑省集》、穆修《穆参军集》、宋祁《景文集》、文同《丹渊集》、徐积《节孝集》、范纯仁《范忠宣集》、黄庭坚《山谷集》、黄裳《演山集》、李纲《梁谿集》、陈东《少阳集》、林之奇《拙斋文集》、吴儆《竹洲集》、陆九渊《象山集》、杜范《清献集》、李昉英《文溪存稿》、谢翱《晞髮集》、黄仲元《四如集》、林景熙《霁山集》、金履祥《仁山文集》,共 282 条资料。其中陈东的资料最为丰富,共有 5 卷 109 条,余如吴儆的生平资料 17 条、李昉英生平资料 20 条、李纲生平资料 48 条、文同资料 37 条、徐铉资料 5 条,范纯仁行状 3 卷等。这些资料虽然也收录于不同版本中,如徐铉资料见于四部丛刊本,李纲的资料见于道光间刊本,但均未见于文渊阁本。对研究各文集撰者的生平事迹,及后人对他的评论等方面,文津阁本更方便检阅,且有史料价值。

《补遗》所收 1160 条资料中,大部分均为启、表、状、文、制、诗、词、赋、书等诗文,形式繁多,其所具的史料价值,视研究者的需要而定,很难一概而论。以笔者的研究专长而言,《补遗》中除上述以附录形式收录各文集撰者生平事迹及后人评述外,其他收录的部分具有史料价值的也不少。

由于篇幅之限,仅举数例为证。吕陶《净德集》卷 24《朝请郎潼川府路提点刑狱杜公墓志铭》,记杜敏求一生事迹(《补遗》二册,页 511~522),《陇西李君墓志铭》记李平生平事迹(《补遗》二册,页 522~526)。《周居士墓志铭》一文(《补遗》二册,页 526~530)记钱塘人周厚的生平事迹,则是一件颇具价值的史料。周厚为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之父,死于熙宁丙辰(九年,1076),享年五十一岁。元丰

八年(1085)二月,邦彦任官后始改葬于钱塘县黄山之原。周厚的传记不见于昌彼得、王德毅等人所编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及李国玲编纂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中,此外,笔者亦未见研究者利用此一资料,则此文有助于了解周邦彦的先世,甚具史料价值。此外《西台集》卷五附《毕仲衍上编次官制卷目稿劄子》一文(《补遗》二册,页767~779)之毕仲衍为《西台集》作者毕仲游之兄。他著《中书备对》30卷,今不存。依仲游所撰之《行状》,仲衍曾对宋官制有所讨论:“抉剔搜补,曲尽其当。及推行,群有司以疑问于君者,日以百数。君指画应对,人人得所问而去,官制遂定,而君亦劳矣。”(《西台集》卷16《起居郎毕公夷仲行状》,页29下)他于元丰三年(1080)八月担任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时,编次官制卷目共有125门六卷,上奏。九月,仲衍与王震兼详定官制的检讨文字,参与官制的制定,成为元丰官制改革的推动者之一。

孙覿所撰《侍御史论和戎劄子》一文(《补遗》三册,页9~16)约作于靖康元年(1126),是金兵进犯汴京前,孙覿所上请求与女真议和的奏文,对了解宋辽金三角关系的变化,颇有助益。而《宋故扬武翊运功臣太师镇南武安国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咸安郡王致仕赠通义郡王韩公墓志铭》(页17~39),则为了了解韩世忠生平事迹最重要而直接的资料,是文津阁本一件重要史料。

胡寅《斐然集》卷18有二篇关于绍兴年间政情的书信,其一是《寄政府》,提到政权南迁后士风的败坏,由于人多职位少,“率皆三、四人而守一阙,至或五、六人而共一官”的局面,形成干求奔竞之风,以及为谋上章求官,形成以投匭为业的风气。为了导正此弊,建议宋廷一面赐荒田给流寓的品官,一面建太学,置官师立士额,以处游士。任官宜精选久任,台谏宜建立制度,两淮、襄汉应招徕流散,广农桑以宽江南民力(页219~228)。《寄赵秦二相》(页229~258)一文作于绍兴八年(1138),是胡寅给赵鼎与秦桧的信。时值赵、秦并相。这封信长达四千八百余字,所论范围从其父胡安国受知于秦桧,谈到定都、地方官任命、士风、朝政、营田之弊,度

州寇乱与韩京关系、消弭盗贼之方等东南军政课题。对了解绍兴八年宋金和议前的南宋内政问题，颇有助益。

文渊阁本《默堂集》卷 13 页 11 下起，有陈渊绍兴九年(1139)任言官后，对宋金和议的四篇奏劄，文津阁本则增列绍兴十年(1140)正月十七日与二十三日二篇《上殿劄子》(《补遗》三册，页 268~285)。这是他评论和议系列奏章的重要部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 134《绍兴十年正月辛巳条》(页 1 上)及《己亥条》(页 6 上、下)中，分别摘录了他的若干意见。这些言论，也是导致他于同年四月乙丑被劾罢的原因(见《要录》卷 135 页 4 上)，是了解宋金关系变化、高宗与秦桧推动和议及朝臣对和战争议，乃至陈渊对和战意见的重要史料。

彭龟年的《止堂集》，文渊阁本卷 1 中失收《应雷雪之异诏陈时政得失奏议》(《补遗》三册，页 433~439)，这篇奏议是抄录自杨士奇所编《历代名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永乐 14 年内府刊本，1989 年 10 月出版)卷 308《灾祥》，时间为光宗绍熙二年(1192)(页 8 下~10 下)，是彭龟年藉雷雪比譬阴阳谏光宗，吁其开言路、听直言、明赏罚、择帅臣。这是在重华宫事件前，关于南宋内政的谏言。此外卷六有二件彭龟年代替知襄阳府张杓论边防事宜的奏疏，一为《代襄阳帅张尚书论边防事宜疏》(《补遗》三册，页 440~441)，一为《代襄阳帅张尚书论边防事宜画一疏》(《补遗》三册，页 441~446)。这二篇奏疏均为绍熙五年(1195)底所上。当时，彭龟年因愤韩侂胄用事，权势重于宰相，条奏其奸，而被外放，以焕章阁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抚使(《宋史》卷 393《彭龟年传》，页 11998)时，替张杓所拟有关边防事项的奏疏。张杓为南宋主战名臣张浚之次子，理学家张栻之弟，于绍熙二年起至绍熙五年底任知襄阳府。第一篇奏疏提到金人有鞑靼之患、河北水旱，流民南下等情事，请宋廷早为之谋。第二篇主要是张杓向朝廷抨击鄂州副都统，以及说明襄阳处极边、田土未辟、商利甚薄，请宋廷降度牒一百道支用，并允许其辟置属官三名。文中所提鄂州副都统不知其名，然考之张杓

传,或指冯湛(《宋史》卷 361《张浚传》,页 11312~11313)。

《补遗》所录文渊阁本失收诸文集的内容,经与现已出版或辑录的资料相互察考,仍可见文津阁本的资料具有学术价值,亦值得加以肯定。在此亦仅举四例加以说明:

一、李纲的《梁谿集》,在台湾影印出版的有汉华文化公司影印清道光间刊印的《梁谿先生全集》及文渊阁的《梁谿集》二种,均为 180 卷及附录。文津阁本附录的文献中,有《李忠定公谥议祠记祭文挽诗画像赞总录序》一文,为其孙李大有于嘉定元年(1208)十一月一日所撰(《补遗》二册,页 822~829)。另有朱熹所撰后序(《补遗》二册,页 926~932)一篇。除这两篇文章外,其余均见于道光刊本,但未见于文渊阁本的附录中。此外,文津阁本卷 131《回福建黄运使启》(《补遗》二册,页 822)一文,亦见于道光刊本,文渊阁本卷 131 则有目无文。

二、刘摯的《忠肃集》20 卷,为四库馆臣辑自《永乐大典》中。文津阁本有八条为文渊阁本所失收,其中卷 20《石棋局》之诗(《补遗》二册,页 554),又见于栾贵明辑自《永乐大典》之《四库辑本别集拾遗》(页 65),而《别集拾遗》另四条(页 64~66)则未见于二种四库本。

三、李昉英的《文溪存稿》20 卷,已刊行的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由杨芷华点校的《文溪存稿》(暨南大学出版)二种。杨芷华的点校本以道光二十年(1840)刊的《粤十三家集》本为底本。除此二种版本外,据杨芷华的记载,尚有六种比较罕见的版本(见点校本《文溪存稿》页 9~10)。文津阁本所本殆为由李瑄朗于乾隆十八年(1753)所重刻之刊本。文津阁本有 20 条不见于文渊阁本中,多属李昉英的生平事迹及后人的评论文字;其中有九条,未为点校本《文溪存稿》所收。

四、杨简的《慈湖遗书》,除文渊阁本外,已刊行的尚有《四明丛书》第四辑所收《遗集》,有十八卷、续集二卷,文津阁本所收四篇《墓志铭》中有三篇亦见于文渊阁本,为重复收录。未收的一篇是

《宋故孺人蒋氏墓志铭》(《补遗》三册,页504~506),亦见于《四明丛书》本续卷一(页27至28下)(详见下节“内容与文字互异”第六条)。

三、《补遗》辑文问题:

以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的比勘为例

《补遗》是以文津阁四库全书为底,辑录文渊阁失收的诗文,这项工作增多了各文集的资料内容,颇富史料价值。不过,笔者将《补遗》与文渊阁四库全书进行比较之后,发现若干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特分项提出,期有助于评估《补遗》的价值。

本节所讨论的共分成五部分,一是重复,指《补遗》所收之诗文,已见于文渊阁本中,而为编者所重复收录;二是就重复的部分进行比对后,发现二书收录的卷数有别,同一篇诗文,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分别置不同的卷数;三是补遗,即文津阁本之内容可以补文渊阁本之阙失;四是二种版本所引文字有异;五是二种版本的内容与文字均有明显差异的情况。本文旨在说明二种版本之歧异,由于篇幅的限制,因此,某些部分只是列举若干事例,而非穷举。

重复收录:比对《补遗》与文渊阁本宋代文集后,发现编者收录已见于文渊阁本的诗文共有三十条。

这些重复的诗文,经比对之后,可以发现二种版本不仅存在同一条目被分置于不同卷数的情况,各条内容也有许多歧异,可资比勘补遗。谨分项举例说明。

(一) 卷数不同

1. 文津阁本《景文集》卷7《元会诗》,文渊阁本在卷8。(《补遗(1)》页559;文渊阁本卷8页1下)。〔文渊本卷7是五言、七言古诗,卷8是五言律诗〕

2. 文津阁本《景文集》卷9《早春》、《西园早春二首》、《答

翁愈赋卷》、《池上》、《北园池上》，文渊阁本在卷 10。（《补遗（1）》页 564~567；文渊阁本卷 10 页 12 上~13 上）

3. 文津阁本《景文集》卷 39《蜀人李仲元赞并序》，文渊阁本在卷 47（《补遗》（2）》页 112~116；文渊本卷 47 页 6 上~8 上）〔文渊本卷 39 是《表》〕。

比对《补遗》所录《景文集》与文渊阁本各卷的内容，发现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各卷有明显差异，兹表列如下：

文津阁本《景文集》	文渊阁本卷数
《内制》、《外制》（《补遗（1）》p. 578~628）：卷 20~22	《外制》：卷 31 页 1 上~13 上 《内制》：卷 31 页 13 下~卷 33 页 15 上 〔卷 20~21 是五言长律，卷 22 是五言绝句〕
《祝文》（《补遗（1）》p. 628~648 &《补遗（2）》p. 1~14）：卷 23~24	《祝文》：卷 48 页 12 下~23 下 〔卷 23~24 是七言绝句〕
《表》（《补遗（2）》p. 14~77）：卷 25、卷 27~30	《表》：卷 36~41 〔卷 25~29 是《奏疏》，卷 30 是《奏状》〕
《奏状》（《补遗（2）》p. 77~112）：卷 35	《奏状》：卷 30〔卷 35 是《颂》〕
《赞》（《补遗（2）》p. 112~121）：卷 39	《赞》：卷 47〔卷 39 是《表》〕
《记》（《补遗（2）》p. 121~127）：卷 42	《记》：卷 46〔卷 42 是《议》〕
《启》（《补遗（2）》p. 127~322）：卷 44~53	《启》：卷 52~56〔卷 44 是《论》；卷 45《序》；卷 46《记》；卷 47《赞》；卷 48《说》、《对》、《述》、《题辞》、《祝文》、《祭文》；卷 49~51《书》〕
《书》（《补遗（1）》p. 569~571 &《补遗（2）》p. 322~340）：卷 19、卷 53,55	《书》：卷 49~51〔卷 19 是五言长律，卷 52~56 是《启》〕

文津阁本《景文集》	文渊阁本卷数
《志铭》(《补遗(2)》p. 341~342): 卷 57	《志铭》: 卷 58~60〔卷 57 是《碑》〕
《祭文》(《补遗(2)》p. 342~345): 卷 62	《祭文》: 卷 48 页 22 上~23 下〔卷 61~62 是《行状》〕

4. 文津阁本《毗陵集》，《表》在卷 6~7 (《补遗(2)》页 948~954)；文渊阁本《毗陵集》的《表》在卷 2~4。

5. 文津阁本《止堂集》，《状》在卷 8 (《补遗(3)》页 455~458)；文渊阁本《止堂集·状》在卷 7，卷 8 是《经解》。

6. 文津阁本《慈湖遗书》卷 19《宋杨公伯明封志》(《补遗(3)》页 497~499)；文渊阁本在卷 18 页 29 上~30 上。

7. 文津阁本《慈湖遗书》卷 19《宋慈谿县孙孝子墓志铭》(《补遗(3)》页 501~504)；文渊阁本在卷 18 页 30 上~31 下。

8. 文津阁本《慈湖遗书》卷 19《钱子是请志妣徐氏墓》(《补遗(3)》页 499~501)；文渊阁本卷 5 页 27 上、下。

(二) 补遗

1. 《雪溪集》卷 1《和江子我见送诗》，文渊阁本“将老犹□行，……多公久□□□□□荆；茅屋照野水，寒窗抱深明，□□□□□，□复缚簪纓，此生才一戏，万物_{以下缺}”(页 7 下~8 上)，《补遗》作“将老犹远行，……多公久要谊，猷纓复班荆；茅屋照野水，寒窗抱深明，相期脱羈网，岂肯缚簪纓，此生才一戏，万物何营营，我行别良友，执袂中心怍，公来贻新诗，折柳何多情，他时簪还盍，莫忘岁寒盟”(三册，页 215)。

2. 《雪溪集》卷 1《送和斜川诗二首并序》，文渊阁本之第一首诗，残缺不全(页 13 下)，《补遗》则全诗俱存(诗一百字，注文十五字)，诗曰：“两脚垂天际，愁云惨不休，寻幽抱奇癖，欲继斜川游，中原苦(“苦”字文渊阁本作“今”)兵革，谁能障倒

流，野老且吞声，踪迹逐闲鸥，策杖过短壑，蜡屐登高邱，临风一长啸，慨然伊吕俦，神交溯二子，新诗远寄酬，鱼鳞生春色，风流似旧不，恰喜心期合，且缓杞人忧（原注：余与二子未免有杞人之忧，聊以自譬），我曹非天厄，伐木反声求”（三册，页216～217）。文渊阁本所存三十二字亦多与《补遗》不同。

3. 《斐然集》卷18《寄赵秦二相》，文渊阁本卷18页22上～24下，其下有阙，《补遗（3）》自228至258页均录此文，可补文渊阁本者多达4175字。

4. 《太仓稊米集》卷21《次韵韩伯嘉拟陆龟蒙坐眠行倚食学书吟八题》，文渊阁本仅有二首，其余均缺（页5下～6上），《补遗》则录六首（三册，页299～300），唯内容与文渊阁本所存二首不同。

5. 《鄮峰真隐漫录》卷11《别拟》，文渊阁本仅举扬雄之说，以学为王者事（页6上～10上），《补遗》另举贞观三年之例，说明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为上策、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及班固赞文景恭俭，移风易俗，共三例，补文渊阁本之缺，共1840字（三册，页333～345）。

（三）异字

两种版本个别字有所不同，如《南阳集》卷2：《补遗（1）》页498，《赠水墨蛮上人》，文渊阁本卷2页5上作《赠水墨蛮上人》；《元宪集》卷10《和致政王子融侍郎喜昭文庞相公登庸诗》：《补遗（1）》页540倒4行“蒲且卷弋冥鸿日”，文渊阁本卷10页6下倒1行作“蒲且卷冥鸿曰”；《景文集》卷9《西园早春二首》：《补遗（1）》页565倒2行“野翠欣欣遍，林红扑扑新……”，文渊阁本卷10页12下4行作“野翠欣欣遍，林花扑扑新……”，等等。这种情况甚多，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出。

（四）内容与文字互异

1. 《元丰类稿》，文津阁本《元丰类稿后序》所录为明陈克昌于嘉靖甲辰（二十三年，1544）仲春撰（《补遗》二册，页548），而文渊阁本《元丰类稿后序》则录元大德甲辰（八年，1304）东

平丁思敬所撰（文渊阁本页 790），二者的内容完全不同。

2. 《太仓稊米集》卷 30《戊辰除夜四绝》，文渊阁本录三首，其中第三首后缺八字（页 2 上），而文津阁本仅录二首，其中一首为文渊阁本所失收：“无功饱食愧侏儒，赢得霜添白颌须，已是再逢生太岁，何须羞饮后屠酥”（《补遗》三册，页 303），另一首则可补文渊阁本所缺之八字“月，诸孙言语似吴儿”（同上，页 302~303）。

3. 《文忠集》（周必大撰）卷 87《贺礼部侍郎曾几启》，文津阁本于“亚八坐于文昌”下作“惟中兴议之秋，且大报躬郊之岁，假涂禁路，姑搜辑于上仪，论政法宫，即咨询于故老。某倾风旧矣，闻问欣然，属司留钥之严，莫展高闳之庆，其为颂咏，罔罄敷陈”（《补遗》三册，页 424~425），而文渊阁本于“亚八坐于文昌”以下尚有 366 字，内容与文津阁本完全不同（页 4 上~5 上）。

4. 文渊阁本《慈湖遗书》卷 18《宋杨公伯明封志》，“仲归舒，后一日有觉，至晦日又大通，于乎，子孙皆觉，又皆竞业，仁守足以垂名于后，载之家传，亦垂不朽，奚假志铭，诚甫以此纸告于父”（页 30 上），文津阁本卷 19 则作“仲归舒钺，季归李竦，孙圭至、学仲，弟朝请郎新差权发遣温州兼管内劝农事某，兴哀起敬以书”（《补遗》三册，页 499），二文内容有异。

5. 文渊阁本《慈湖遗书》卷 18《宋慈谿县孙孝子墓志铭》，于“王嘉其诚，不夺其志，致馈帖叙其事”后下接“祖璿左朝议大夫知江阴军……”等共 305 字（页 31 上、下），而文津阁本卷 19，则于其后接“吁，人情惊异为甚难也，以此为难，则夫人皆知爱其亲之心为异乎……”等共 214 字（《补遗》三册，页 503~504），内容完全不同。据笔者核对后，发现文渊阁本所接之 305 字，原为该本失收《宋故孺人蒋氏墓志铭》之后半段。比对文津阁本可知该文在“祖璿”前尚有 81 字及标题。参见《补遗》三册，页 504~506。文渊阁本失收《孙孝子墓志铭》部分，应补以文津阁本。

6. 文渊阁本《江湖长翁集》卷 22《秀野堂记》，“中间兵缠淮

地，堂废诗亦不传，绍兴辛巳，国家引”以下有“斋宫贡士有院而不愿教养之地……”等84字（页6下~8上），然后续之文字与前段无法连读。文津阁本则在“国家引”之下，为“元祐故实，升县而郡之，四十二年矣，而守者多故，欲复之未暇也，乃今有成。夫游观燕息之地……”等405字（《补遗》三册，页558~561）才是后续部分。

7. 文渊阁本《蒙斋集》卷9《叶莫除吏部郎中制》，“践历寢深，顷”下接“勤于审计，尔三异韬养，不露精于典校，朕察其德心，盖能安于素守者，或晋联胄监，或列属奉常，皆清选也，尚其懋勉以对休命”（页13下~14上），文津阁本在“顷”之后则接“以麾节宣劳江右，趣还郎位，所以旌外庸也。尔其一意奉公，恪守旧章，为朕搜隲贤，拔淹滞，以成思皇多士之美，则予汝嘉”（《补遗》三册，页640）。

四、《湖山类稿》校异举例——以文津阁本与《增订湖山类稿》比勘为例

文津阁本之集部除可补文渊阁本之遗漏外，对已点校刊行之典籍史料亦颇有可资补正校勘之处。谨以在《补遗》一书中所列《湖山类稿》为例，说明文津阁本之价值。

《湖山类稿》是宋末汪元量所著。他是琴师，又是诗人、词人，曾给事南宋宫廷，后来随宋三宫入大都，在北方逗留了很长的时间，一生经历宋、元之交社会急剧动荡的年代。他在诗作中，对宋、元政权递嬗时，宋廷权臣与新权贵种种现象，都有强烈而深刻的刻划，有着浓厚的历史意义，被誉为“诗史”。原有《湖山类稿》为其友人刘辰翁所选。类稿与外稿共收诗三八〇首、词二十九首，后来孔凡礼先生又自明抄本《诗渊》及《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诗一〇〇首、词二十三首，刊行点校本的《增订湖山类

稿》，于一九八四年六月由大陆中华书局出版。

《湖山类稿》诸本中，以清人汪森本所收诗文为多，计《类稿》收诗 203 首、词 28 首，《湖山外稿》收诗 176 首、词 1 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收诗 140 首、词 28 首。孔凡礼辑校时，未见文渊阁本及文津阁本。文津阁本较文渊阁本多 23 首诗，这二十三首均见于《增订湖山类稿》（以下简称增订本），颇有参校的价值。

五、文津阁本《景文集》的学术价值：以《补遗》与《全宋文》的比勘为例

《补遗》所录宋代文集中，以宋祁的《景文集》所占篇幅最大，约为《补遗》中宋文集全部的一半（481 页），收录诗文亦有 481 条为文渊阁本所失收。但其中大多数为启（189 条）、口宣（58 条）、表（45 条）、祝文（43 条）、制（40 条）、状（33 条）、诗词赋（合计 24 条）、书简（19 条）、诏书（16 条），除了具史料价值外，在版本、辑佚上也颇有意义。

《景文集》的作者宋祁字子京，安州安陆人，后徙开封，父宋玘曾任九江掾，与兄庠同举天圣二年（1204）进士，人呼“二宋”。累任国子监直讲、授直史馆、太常博士，迁龙图阁学士、史馆修撰。与欧阳修同修《唐书》，旋出知亳州，出入内外，尝以史稿自随，《唐书》成，迁左丞，进工部尚书，以病，拜翰林学士承旨，嘉祐六年（1061）死，年六十四，谥景文，有文集百卷、《益部方物略记》、《笔记》、《大乐图》等。文集名《景文集》，现存六十二卷，为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已刊行诸集中除文渊阁本外，尚有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点校本部分。

《全宋文》是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负责，共收宋代文三、四千万字，为《全唐文》的三、四倍，辑录的范围、时间从西元九六〇到一二七九年为断，空间上凡曾仕于宋，及曾居于宋地方者均视为

宋人,所收为诗、词、谣、谚,小说以外的一切散文、骈文、辞赋均属之,包括赋、制、诰、诏敕、策问、奏议、策、牋、表、露布、移文、启、书、论、议、序、跋、疏、判、连珠、颂、赞、启、箴、传记、杂说、谥议、碑文、墓表、墓志、行状、祭文、祝文、醮词等,集外单行的宋代学术著作、诗话、笔记的作者序跋,和其他宋人序跋均收。编纂《全宋文》时,也广泛进行辑佚的工作,共查书七千余种、拓片法帖三千余帙,同时进行文集点校工作。全书预定出版一百五十册以上,目前暂时出版至五十册。

《全宋文》卷四八二至五三一,收录宋祁的文章,系以《湖北先正遗书》本为底本,校以佚存丛书第六帙所收宋残本《景文宋公集》(简称佚存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库本),辑录佚文七十余篇。共编为五十卷,这是目前最完整的《景文集》。

不过,以《补遗》中所录文津阁本的481条《景文集》与《全宋文》所录相较,可以发现《补遗》所录资料颇有可补《全宋文》之不足。

《补遗·景文集》共481条,和《全宋文·景文集》互校,有87条重复。《全宋文》失收的则有394条。就重复的87条而言,有的标题不一致(21条),有的内文有异(65条),个别文字有出入者尤多,有益校勘。

六、结 语

四库全书修纂时,七个不同阁本是否出于一源的问题,经过图书、版本学者,利用北京图书馆庋藏的文津阁本,与已影印出版之台北故宫博物院庋藏文渊阁本所有集部书核对之后,发现二种阁本所录文集,不仅篇、卷有相当大的差异,内容与价值也因书而异。这方面的研究,请参见《北京图书馆馆刊》所刊相关论文。笔者因未见文津阁本,亦未能比对文渊阁与文津阁二种不同

版本的文集资料，因此对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的价值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无法提供更具体而深入的意见。

不过，透过对《补遗》所录的内容，进行较细部的研究之后，发现文津阁本中宋代文集的部分，保留了不少各书作者个人生平事迹及诗文的评论资料，对研究各文集的作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讯，此外文中也保留许多对研究宋代史事有所助益的史料，显示文津阁本的史料价值。就这点而言，文津阁本自有其利用价值。

除了史料价值外，文津阁本也收录了若干丰硕的文献资料。《补遗》所收宋祁的《景文集》，可补目前已出刊、收录最为丰富的《全宋文》中《景文集》的诗文达三百九十四条，文献价值显而易见。即以重复的八十七条资料而言，文津阁本仍具有补正遗漏的作用。而《湖山类稿》一书，文津阁本可补正目前已出版、汇集资料最丰富的《增订湖山类稿》达22条，对研究汪元量生平事迹、诗学及宋元之际的政经现象，极有助益。即此二种的比对而言，文津阁本的价值，已值得肯定。

当然，从已刊的《补遗》资料看来，文津阁本所录亦多制诰、启、状等公式性的文字。此外，由于编者的疏失，仍有三十条资料被重复收录的。虽然就研究者而言，比对这三十条的资料，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的异同，但就《补遗》的角度而言，编者这一疏忽，显然是一项值得批评的瑕疵。

笔者所据以讨论的部分宋代别集，约仅占《补遗》全套十五册的六分之一而已，元明的别集及总集部分，尚有多达六分之五的篇幅，实在值得有志的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甚至对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进行个案的研究，使文津阁本的价值及其问题更为清楚，进而能对四库全书作进一层的分析、讨论及评价。

作者工作单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耿素丽）